

“启蒙与救亡”语境下的韩族英雄叙事

吴敏 华东政法大学 miao_wu97@hotmail.com

目 录

- I. 引言
- II. 台静农和《我的邻居》
- III. 周作人和《李完用与朴烈》
- IV. 台静农与周作人创作思想上的联系
- V. 《我的邻居》与朴烈事件
- VI. 结语

I. 引言

在莽莽的中国现代文学丛林中，有一块至今尚显冷清，中国研究者少有涉足的领域，即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抗日时期韩人形象的作品。

这些作品描写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因国破家亡而逃离故土的朝鲜流亡者，反映了他们丧失祖国后受尽屈辱、压迫的严酷境遇，表现了他们从悲愤交集到奋起反抗的艰难历程。其中有以个体微弱之力抗击侵略者，从而赢得“自我”尊重的“他者”形象，如蒋光慈的《鸭绿江上》（1926年）、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也有参加游击队或秘密抵抗组织，以集体力量有组织展开对日斗争的形象，如台静农的《我的邻居》（1928）、李辉英的《万宝山》（1933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35年）、戴平万的《满洲琐记》（1936年）、巴金的《发的故事》（1936年）和《火》第一部

(1939年)、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1938年)、骆宾基的《边陲线上》(1939年)、舒群的《海的彼岸》(1940年)、刘白羽的《金英》(1944年)。此外,还有描写韩国国内民众浴血抗日,以及韩国皇族内部抗日意识的作品,如无名氏的《红魔》(1947年)和《龙窟》(1947年)。凡此种种,总共有14篇韩人抗日题材的小说¹⁾。此外,还有同类题材乃至表现同一事件的不同文类,如散文和诗歌,与小说交相映衬,形成了颇为特殊而壮观的韩人形象作品群。

如此颇具规模的“他者”形象作品群,为何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呢?笔者以为:一是这些作品大部分不是该作家的代表作,如台静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乡土文学见称,但《我的邻居》却与乡土文学毫不相干;与无名氏如雷贯耳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以及巨著《无名书》相比,《红魔》和《龙窟》不过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片断而已,作家无心续写,研究者自然也无暇顾及;而巴金甚至认为《火》三部曲“全是失败之作²⁾”。二是缺乏新的研究视角。在传统研究的视角下,上述作品塑造的韩人形象,与作家塑造的其他形象并无二致,并不具有特殊意义。“韩人形象作品群”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畴,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的差异在于,它研究的是“他者”的形象³⁾,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⁴⁾”。被视为“以新视角来研究新事物⁵⁾”的手段。但从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正处于封闭状态,缺少滋养比较文学的土壤。因此,比较文学研究趋于迟缓、停顿甚至倒退。在缺少新视角的情况下,少有人关注、研究“韩人形象作品群”,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用比较文学的视角,上述作品塑造的“他者”形象群,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特殊历史时期韩国及其国民的注视和认识,这些形象虽然不能全面反映韩国内外风起云涌的抗日活动之全貌,但在表现亡国奴的悲惨处境、揭示韩人赴汤蹈火、奋勇抗日的义烈行为和精神、呼唤国人警惕日本侵略野心、警示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民族危险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此外,这些作品在同情韩人的亡国命运,声援其抗日斗争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协作和韩中联合斗争的主题,如李辉英的《万宝山》和戴平万的《满洲琐

1) 参见朴宰雨:《韩国际合作精神的艺术表—论中国现代小说里韩人抗日斗争的反》,《当代韩国》2005年第4期。

2) 巴金:《关于〈火〉》,《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巴金卷》,蓝天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3) [法]巴柔著:《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像物》;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35页。

4) 同上,第118页。

5) 同上,代序。

记》等，这些作品所体现出的民族平等思想和国际主义大义，今天读来依然有可贵的启发意义，可以成为反思20世纪那场世界性人道主义灾难的重要学术资源。

作为这些作品系列研究的起始篇，本文拟运用传统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视角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文化心理学和叙述学角度，就台静农的小说《我的邻居》，以及周作人的散文《李完用与朴烈》，作一些深入的考证和评析，以图揭示这两篇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挖掘两位作家创作中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研究台静农和周作人的创作手法、情感意蕴、艺术旨趣及美学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拟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着力探索“他者”形象所折射出的心理倾向、价值评判，探讨“我”与“他者”之间隐藏着一种怎样的等级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他者”形象是否符合当时整个社会对韩国的看法，即符合“社会集体想像物⁶⁾”，力求解读小说背后蕴含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

II、台静农和《我的邻居》⁷⁾

应当说，《我的邻居》是台静农小说中非常独特的一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台静农以“乡土文学”早期代表人物的身份，被载入文学史册。鲁迅对他评价甚高：说他是“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⁸⁾”。但《我的邻居》却完全不同于乡土生活题材，而是一篇题材特殊、写法别致的描写“他者”形象的小说。当笔者研读《我的邻居》后，发现其不仅题材独特、叙事观点独到、人物细节刻画生动，而且由于“我”和“邻居”之间隐藏着非常丰富、深邃的等级关系，导致其内容含蓄、主题多元，给读者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审美空间。遗憾的是，这篇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和认识价值，至今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这篇完全采用旁知观点⁹⁾叙述，几乎没有情节只有细节的短篇小说里，作者通过一

6)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7) 载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地之子》，这是其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于1928年11月，作者时年27岁。

8)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5。

9) 在[美]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里，观点为一“视角”

系列揭示人物精神和意志的独特细节，描绘了一个孤独地漂泊在异国他乡，日夜蛰伏在学生公寓的一间阴森黑屋里，实际上却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谋划惊天动地大事的韩族英雄，让人掩卷后深思不已、回味无穷。那么，其审美效果和艺术感染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这得益于小说中旁知观点¹⁰⁾的叙述方式。

台静农的一系列乡土小说在叙述方式上都有一贯的自觉追求，那就是在以全知观点为基本叙述手段的基础上，大量运用旁知观点进行叙事。

所谓“全知观点”，是指作家站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角度叙述故事。这是古典小说中最普遍、也是现代小说家最常用的叙述方法。而“旁知观点”，则是通过作品中次要人物的口、以第一人称之“我”的角度叙述故事。

旁知观点的叙述方法，在台静农乡土小说中被运用得十分普遍，如台静农的第一篇乡土小说《天二哥》；《地之子》中的《红灯》、《新坟》、《烛焰》、《负伤者》等，都采用了先旁知、后全知、再旁知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由于被台静农反复使用，已经成为台静农乡土小说的叙述模式。

相比之下，《我的邻居》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全然抛弃了全知观点叙事，通篇采用旁知观点叙事。可以说，台静农在《我的邻居》里，将旁知叙事的叙述方式发挥到了极点。

旁知叙事的最大优点，是让读者产生一种“直接介入感和期待感¹¹⁾”，使之不知不觉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我的邻居》从头至尾的旁知叙述，使读者成了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仿佛与一位神秘邻居不期而遇，因其种种不可思议的怪异举动，而产生揭开其身份之谜的强烈期待；随着谜底的揭开，当我们开始对异国邻居深表同情时，他却突然被捕而从眼前永远消失了，令人惊愕之余不免为之扼腕。小说中的点睛之笔，是开篇介绍的报上关于日本的一则新闻，说有“朝鲜人，谋炸皇宫，被警察擒住，已于某某日正法……”。这则报道在小说开头出现，似不经意，却有伏笔的匠心，当读者读到小说最后，邻居被捕，谜底揭开，再回想开头的铺垫，终于恍然明白邻居所有神秘怪异举动的原因。这无疑大大升华了邻居的形象，使之成为读者心目中的抗日英雄，令人肃然起敬，作品亦生

10)“观点”在罗杰·福勒的《语言学与小说》中既被称作“观点”，又被称作“话语”。关于小说中四种基本的叙事观点，可参阅孟《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文学评论》1985年第5注

11)华莱士·马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199，15页

出回味无穷的余韵。

其次，这归功于人物细节刻画的成功。

由于旁知观点受视野、叙述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叙述一切故事，而我的邻居，又是一位身份不明，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的人物，因此，除了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外，几乎没有其他叙述手段，于是，便形成了小说没有情节只有细节的特点。应当说，作者在细节的精心选择和生动刻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刻画细节所用的简练、含蓄而极富包含性与暗示力的小说语言，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如“短小精悍”，加上我“拟定这位邻居是广东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定格了人物的外形；而“脸上微微有些麻，双眉如两把短刀，往下蹙着”、“神情宛然一只饥饿在腹中燃烧的鹰，张开眼睛四望之后，双眉便立刻攒聚起来”、“嗓音“沉重而且尖利，好像一个军人在战场上发令似的”之描述，让读者从寥寥数语中感受到人物性格中蕴藏的坚韧、刚毅和勇猛。又如，“头发已经脱顶，却不像一个秃顶的老学者”的描写，给人物平添了忍辱负重的历史沉重感，并为其与年龄不相称的怪异、诡秘举动留下了伏笔：他似乎终日蛰伏在阴森的房间里，最多在小院里“从他的门口走过我的门口，又从我的门口走到他的门口，皮鞋格格格的响”；而房间里“常有一种擦火柴的声音”，甚至可以“看见这阴森的房中的青烟，丝丝地不绝地喷出”；“一次，他来了一个朋友，最初是彼此都很惊喜似的；谈话也很迅速，渐渐声音便低微了”；“他也偶然收到来信，数分钟后，便听到擦火柴，似乎就将那信焚毁了，我的房里同时窜入焦纸的臭味”。总之，由一系列细节塑造的人物，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又留下了巨大的审美空间，让读者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想象人物以往的故事和他正在从事的事业。

第三，作者在旁知观点承担者之功能上的独具匠心之开拓，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而且，这一创作手法的成功运用，大大拓展了小说主题的空间，使这篇仅数千言的短篇小说，具有了极为深远的意蕴。

在“我的邻居”中，旁知观点不仅承担着叙述功能，而且承担着塑造叙述者自身形象，并与被叙述者形成鲜明对比和衬托关系的功能。与邻居相比，“我”在冬日上午的8点时分，“仍旧在温暖的被窝中留恋着有如一条蠕虫……课也不去上”；起床后，又“斜倚在藤椅上，负着阳光使全身温和与舒畅，正如一个老年人在阳光之下消逝他的末日”；在阅读有关内战中无数死者的报道时，“我对于他们没有丝毫的惋惜，还冷漠地嘲讽：“中国人尽多呢，打杀也是有趣的”；至于平日里最大的乐趣，是“到S女学校去看跳舞会”，和朋

友约好“要早些去，事后好多得些评论的资料”。这样一个谈不上醉生梦死，却也够浑浑噩噩的形象，既不是作者随意杜撰，也非信手拈来，更非作者自己的化身，而是作者在痛感时政、时弊及国人之麻木；震撼于韩人殊死抗争之精神后，精心塑造出来的，具有极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历史象征意义。

正是这种旁知观点的匠心开拓，形成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之间的二元对立及互动关系，“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¹²⁾”，使得“我”和“邻居”成为当时中、韩民族不同历史境遇、不同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和象征。朝鲜民族长期生存于周边大国的夹缝之中，与大国周旋、相处的历史，既造就了其与邻国和睦相处、渴望和平的民族性，也形成了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民族独立的另一面。“邻居”这样的义烈壮士，正是朝鲜民族处于生死关头之机的典型形象。同时，“邻居”又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麻木不仁、暮气沉沉的“我”：躺在泱泱大国和古国文明中安然消磨时日，麻木于军阀们的“开战游戏”；津津乐道女校的跳舞会，颓然于低俗的精神等级，毫无进取之心。这个“我”，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麻木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典型化写照。一般而言，塑造“他者”形象的“自我”，通常“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¹³⁾”，表现出抑他扬我的等级关系，比如，“当我们研究西方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形象时，我常常发现，第三世界总是被描写成传统的、农业的、附属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的和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¹⁴⁾”。但是，“我”和“邻居”则恰恰相反，是“他者”对“自我”的否定，其内涵是血性与懦弱、崇高与渺小、壮怀激烈与颓废浑噩的尖锐对立。那么，这种对“他者”形象的认识，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社会集体想像物”呢？

就朝鲜半岛而言，早在丰臣秀吉¹⁵⁾时代，就开始饱受日本侵扰，这场噩梦不但持续了几百年，且登峰造极之处，竟是亡国被奴役的现实¹⁶⁾。因此，韩人可谓处在被人“置于死地”的最后关头，正为“后生”而作殊死的搏斗。以针对敌酋引起较大震动的事件为例，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侵朝元凶伊藤博文，其后英勇就义；1923年9月3日，密谋炸皇宫刺杀皇太子（即后来的昭和天皇）的朴烈在东京被捕，1926年3月

12) [法] 巴柔著、孟华译：《形象（节选）》；载乐黛云、陈淳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页。

13)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页。

14) 同第240页。

15) 丰臣秀吉（1536~1598）完成日本统一后，于1592和1596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

16) 1910年8月，日本迫使李朝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

25日被判处死刑¹⁷⁾；而上述事件的背景，则是朝鲜半岛内外波澜壮阔的民族反抗运动。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正处于外患内忧的多事之秋，虽然日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霸占朝鲜半岛之最终目的是染指中国；虽然日本在东北已开始演绎曾经在朝鲜半岛施行的惯用伎俩，但大多数中国人当时并无警惕和忧患意识，对于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亦无唇亡齿寒之感。究其原因，近代中国的屈辱和国际地位的持续弱化，使整个社会在极度失落和悲情中也产生着麻木和颓废，因而，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朝鲜半岛乃至其被日本侵占，处于一种漠然或袖手旁观的心态，而长期形成的邻国形象，无外乎“小国”、“穷国”、“能歌善舞”、“深受儒家影响”之类。虽然流亡中国的韩人制造了几起惊天动地的事件，但以中国之大及信息不畅，其影响有限；且大多数流亡者集中在东北，一般内地民众难以与之接触、交往乃至产生敬意。据此，可以认为台静农塑造的“邻居”形象，与当时的“社会集体想像物”差距甚大。“一般而言，那些背离了社会集体想像的文本是更值得关注的¹⁸⁾”，因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¹⁹⁾”；而且，“它对于集体想像的反作用也表现得最为明显²⁰⁾”。笔者以为，“邻居”形象与集体想像物的强烈反差，正是《我的邻居》的文学和社会价值之所在，体现了五四时期革命文学青年救亡图存，重构“强国梦”的历史目标，以及通过启蒙摆脱封建传统束缚，获得现代“自我”，得到个人解放的宏大目标。所谓世人皆醉我独醒，正是当时文学救亡与启蒙运动的真实写照²¹⁾。

凡此种种，在作者匠心独具的笔下，便浓缩成了无所事事、虚度青春的“我”，与忍辱负重、舍生忘死的“邻居”。作者通过“我”在异国邻居面前“顿然觉得”渺小、惭愧乃至忏悔；“漠然于战争把戏”的我，对于邻居的被捕，却“心中的火焰狂烧”，异常愤怒、痛恨和焦灼；通过赞叹其“为了你沉郁的复仇，作了这伟大的牺牲”等描述，表达了对浴血抗争之韩人的深深敬意，更有唤醒同胞以韩人为楷模，警惕日本侵略野心之意。至此，“我”与邻居之间已建立起丰富的精神联系与情感联系，由隔膜、不解到同情、钦佩和赞

17)其后改为无期徒刑。

18)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238页。

19)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9页。

20)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238页。

21) 李泽厚80年代的研启蒙和救亡这两五四现代的不同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结构，即所谓“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参见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7~49页。

叹,“我”对邻居的态度,已超越了作为个体的观察和思考,而上升到了中、韩两个民族休戚与共的象征层面,启发读者去体悟这两个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共同命运。

笔者的上述认识,并非天马行空、主观臆测,而是有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印证。周作人的散文《李完用与朴烈》²²⁾,就是典型一例。

Ⅲ、周作人和《李完用与朴烈》

在这篇短短的论文中,笔者无意评价周作人其人,只是想说明:在朴烈事件上,周作人是当时中国作家中,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并在向日寇投掷匕首的同时,对国人发出振耳呐喊之人。

就笔者而言,便是从周作人的作品中,意外获知了朴烈,并顺藤摸瓜寻觅到了这位朝鲜民族英雄的足迹:朴烈(1902~1974)曾在中学时代,听日本教师说起过幸德秋水²³⁾暗杀天皇的故事,深受影响;17岁那年,他就参加了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并加入义烈团;其后,他一直在日本组织各种反日活动,与国内的抵抗运动遥相呼应;1922年2月,朴烈接受了远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之指令,开始谋划暗杀计划;为此,他不但在东京组织了“不逞社²⁴⁾”,还为策划暗杀和获取炸弹,多次回汉城与义烈团的负责人金翰会见;但不幸被告发而遭逮捕

值得回味的是,朴烈正是在曾经审判过幸德秋水的法庭上,先后接受4次公审,并最终以同样的“大逆罪”被判处死刑²⁵⁾。

对于这样一起轰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事件,周作人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运用“短平快”的散文形式,在日本《读卖新闻》刊登有关报道后不久,便在北京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李完用与朴烈》。

文章伊始,周作人便使用其最惯用、擅长的表达方式:不露声色、皮里阳秋,把亲手

22) 载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23) 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早期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911年以“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被处死。

24)“不逞”是贬义词,有犯法为非之意,朴烈组织“不逞社”,取叛逆之意。

25) 有关朴烈的上述内容,参照《大逆事件》,wwjwikipedior

葬送朝鲜、故而临终还受天皇赐酒的李完用，与被问“大逆罪”的朴烈扯在一起，并用表面和气从容的文字揶揄到：“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李完用倒是确实的逆徒”，而朴烈“总可以说是烈士，更不必说是朝鲜的忠良了。”接着，周作人将浓墨泼向朴烈代表的朝鲜，“我对于这亡国的朝鲜不能不表示敬意”……“朝鲜的民族，请你领受我微弱的个人的敬意”……“我以前只知道你们庆州一带的石佛以及李朝的瓷器，知道你们的先民富有艺术的天分，现在更知道并世的朝鲜人里也还存在血性和勇气”。周作人和台静农一样，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不屈不挠、浴血抗争的朝鲜民族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描绘了与“社会集体想像物”迥异的“他者”形象。正当读者为其赞美之词而感染、感慨时，周作人却话锋一转，语气未免有些激烈：“特别在现今这个中国，满洲的情形正与合并前的朝鲜相似，而政客学者与新闻界的意见多与日本一鼻孔出气……我相信中国可以有好些李完用，倘若日本（或别国）有兴趣来合并中国，但我怀疑能否出一两个朴烈夫妇。”而文章的结语，更是一语道出了主题：“我们看了朝鲜的往事，不能不为中国寒心。”在这里，周作人和台静农体现出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通过“自我”与“他者”的等级关系，颂扬了异域他者的精神和气节；嘲讽和批判了安于现状，麻木、昏睡而缺乏“血性和勇气”的本土国人；并传递了“自我”悲愤交集、忧心如焚的心情。

朴烈于1926年2月26日第一次公审后，周作人又迅速作出反应，在《京报副刊》上以译文《大逆之审判》²⁶⁾的形式，全文翻译了《读卖新闻》的相关报道。这次，中国人通过周作人手中之笔，领略了朴烈在法庭上儒雅而有血性的风采：“穿着飞鹤花纹的紫色朝鲜服，头着纱帽，手执扇”……“姿态如画，也看不出是可憎的反逆儿”；他穿着朝鲜民族服装，坚持用朝鲜语回答法官的问话，“依然是极可恨的不逞态度。”虽是一篇译文，字里行间却无不透出作者发自内心的感动、赞扬和敬佩。

读完两文，笔者不能不感叹周作人文章的刚柔兼济、锦里藏针，真可谓不动声色开骂、不露锋芒刺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绍兴师爷”倔强刚硬的文采，酣畅淋漓地发挥了散文的短平快作用。

当然，笔者在感叹之余，更感兴趣的，是探讨周作人和台静农，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关注“他者”的民族命运，塑造出与“社会集体想像物”相异的韩人英雄形象，并由此及彼，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敏锐嗅觉。

26) 载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IV. 台静农与周作人创作思想上的联系

从社会历史学角度来看，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作家自身的社会经历、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其创作思想，并对其作品的主题和风格产生重大影响。

考察台静农和周作人的经历，可以发现虽然两人的出身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迥异，却同处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大旗，将许许多多具有新思想的文学青年召唤至其麾下，这是一个群星汇集、光耀人间的时代，鲁迅、周作人、台静农等都是具有鲜明时代感悟力和共同艺术旨趣的作家。以往，评论家们较多提及的是鲁迅与台静农的关系，很少有人将周作人和台静农联系在一起。其实，无论从“乡土文学”的倡导、实践和共同文学志向上，还是北京大学的共同背景上；无论是对时政、时局尤其是朝鲜民族命运的关注，还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上，都可以寻找到周作人对台静农的影响，寻找到两人丝丝相连的关系。

首先，周作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²⁷⁾。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周作人和文学研究会的另一主要理论家沈雁冰等都是‘乡土文学’、‘农民文学’的最早倡导者²⁸⁾。1923年，周作人在多篇文章里，一再提倡“乡土艺术”，明确提出要“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充分张扬“风土的力”，“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²⁹⁾，并充满自信地宣称道：“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³⁰⁾”。周作人的文学理论“对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发展都起过巨大的作用”³¹⁾。而台静农正是“乡土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可以说，台静农的“乡土文学”创作，既受鲁迅乡土小说创作实践的影响，更受周作人“乡土文学”理论的影响。共同的文学倾

27)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纯文学团体，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周作人沈雁冰等，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文学革命。

28) 家：《中代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年，4页。

29)周作：《地方与艺》，载《谈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年，1页。

30) 周作《旧》，载附1921日。

31)严家炎：《五四的误读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第151

向和主张，往往是连接作家关系的精神纽带，台静农与周作人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上可谓志同道合。

当然，就《我的邻居》、《李完用与朴烈》和《大逆之审判》而言，这种共同的审美追求，已经超越了乡土小说的范围，体现了两位作家对“他者”与“自我”、“异域”与“本土”形象的共同审美倾向。他们用“饥饿在腹中燃烧的鹰”、“沉郁的复仇”、“伟大的牺牲”与“烈士”、“朝鲜的忠良”、“血性和勇气”等描述，颠覆了以往朝鲜民族在本土集体想像中的形象，感叹韩人在民族存亡的悲惨命运中挣扎，赞扬他们在挣扎中抗争的壮烈和血性。他们用“一条蠕虫”、“消逝他的末日”与“中国可以有好些李完用”、“怀疑能否出一两个朴烈夫妇”的强烈对比，以丑化了的本土形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³²⁾”，试图用手中之笔，披露日本的觊觎之心，唤醒昏睡的本土之人。同时，他们又以“心中的火焰狂烧”与“不能不表示敬意”的描述，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展现了与本土民众不同的“自我”形象，既传递了焦虑和忧患的心态，更表达了“世道剧颠簸，我心如砥柱³³⁾”的心志。“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像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³⁴⁾”，在上述作品中，台静农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构建了他者、自我、本土之三足鼎立的形象结构。

其次，北京大学可谓连接周作人和台静农的重要纽带。周作人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文学史；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周作人为主任；1925年，北京大学成立新的东方文学系，周作人任筹备主任；周作人长期在北大教学，可谓北大的资深教授。而台静农于1922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生资格，1924年考取北大研究所国学研究生，当为周作人的弟子。但是，重要的并非两人的师生关系，而是当时的北大，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活动着许多朝鲜独立运动者的身影。如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柳絮（字基石，又名柳树人），在朝鲜留学生中组织了“朝鲜黑帜团”，积极参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用暗杀、爆炸等手段同日寇进行斗争。1925年，他和中国人方宗螯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大师张继（时任民国大学理事长）、李石曾（北京大学教授）、吴稚晖（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元老）和蔡元培（北大

32) 鲁迅《摩罗诗力说》最初发表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和三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署名令原：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

33) 唐·刘禹锡：《咏史二首》，载中华书局《全唐诗》1960年版，卷364第19页。

34) [法]巴柔著、孟华译：《形象（节选）》；载乐黛云、陈淳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第459页。

校长)的支持下,主办《东方杂志》,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³⁵⁾。而鲁迅、周作人,则与朝鲜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元老李会荣、申采浩等交往甚笃,经常联络,共同探讨无政府主义思想。鲁迅、周作人是台静农在精神和文学上的导师,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台静农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其塑造的“邻居”形象,正表现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明显特征。

第三,在台静农和周作人的经历及文学活动中,都表现出对时政、时局,尤其是朝鲜民族命运的关注。

台静农是安徽霍邱叶集人,在他参加的“未名社”中,有4名叶集人,他们从小就是同班同学,长大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辛亥革命后,他们受新思想影响,在家乡发动了一场砸佛像、剪辫子的运动。到北京后,他们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除出版《未名丛刊》登载社员的译作外,还先后发行《莽原》、《未名》两个半月刊。由于“未名社”从事国外革命文学的翻译活动,1928年4月被北洋政府查封,台静农等4人同时被捕,在前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整整50天。在这段囚禁的日子里,他们虽然生死难卜,但还在想着出狱后要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从上述简要经历看,台静农关心时局、忧国忧民之心可谓由来已久。因此,日本吞并朝鲜、觊觎东北,当在台静农急切关注的视野之中,通过创作《我的邻居》来颂扬不屈不挠的韩人,以此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是他长期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的真实体现。

周作人22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资格,27岁学成回国,精通日语、英语和希腊语,长期留洋生活及语言上的造诣,使周作人得以放眼世界、胸怀天下;同时,也使他能够群览各国文学名著,并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认为“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和人生诸问;作家一定要怀着‘悲哀或愤怒’的感情,抱着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去反映现实³⁶⁾”。当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奴役朝鲜人民时,周作人表现出“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态度,对铁蹄下的朝鲜民族表示由衷的同情和悲哀;对朝鲜民族表现出来的“血性和勇气”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又对国人的随遇而安、麻木不仁、丧失血性表达了痛心疾首的愤怒。凡此种种,均集中抒发在了《李完用与朴烈》、《大逆之审判》等一系列文章里。此外,周作人虽然没有写过塑造韩人形

35)《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20页。

36)参见卢洪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象的小说，但对朝鲜民族一直怀着善意和关注。周作人于1925年4月为《朝鲜传说》一书作前言，还亲自翻译了《崔致远》、《斗法》和《掉文》等三篇朝鲜传说故事³⁷；1931年10月又为《朝鲜童话集》一书作序³⁸。为一个被法西斯从世界版图上抹去的国度和民族出书，依然堂堂正正地冠其民族之称，弘扬其悠久文化中的美丽传说和童话，本身就是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叫板，更有替朝鲜民族声张其民族认同感的深刻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虽然身在北京，却依然时刻关注着日本，能在第一时间获知日本的各种新闻。朴烈之被捕和审判的消息，就是从日本报纸《读卖新闻》中看到的，他迅速作出反应，投入了自己的悲哀、愤怒和忧虑。而台静农在周作人文章发表半年多后，创作了《我的邻居》，无论从韩人英雄的共同形象塑造上，还是从周作人对台静农的种种影响上，都可以推断出其中的内在联系。

可以说，在“人的文学”的现实主义舞台上，台静农和周作人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地共同演绎了痛感异域他乡之人道主义悲剧、深虑本国故里之唇亡齿寒命运的启蒙和呐喊剧。只是台静农采用小说形式，以“我”和“邻居”的鲜明对比为载体；周作人则通过散文，以“李完用”和“朴烈”的忠奸为媒介。小说不能空喊口号、滥发议论，更忌讳说教，只能通过人物形象来象征性表达，而散文则以事实为依据，得以广发议论，直抒胸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的《李完用与朴烈》，无意中为《我的邻居》作了精辟的注解，让读者加深理解了“我”和“邻居”的时代内涵和历史象征意义，《大逆之审判》中的朴烈形象，又可以视为“邻居”的后续。

当代比较形象学注重塑造者主体的研究，认为“制作了异国形象的个人或群体，通过对异国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出的，实际上是一个创造出来的异国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用形象化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所向往的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³⁹”。笔者以为，本土的塑造者主体是错综复杂的，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也。而在创造的异国空间里，表达了共同向往的塑造者，可谓同一类“自我”，亦即本土中志同道合之群体，具体而言，就是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青年。以此标准考察韩人形象作品群的塑造者，绝大多数都在各自塑造的异国空间里，表达了共同的向往，而且，这种向往虽然与当时的

37)《前言》和《掉文》原载《语丝》第28期，1925年5月。收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

38)原《故事》，上海女1932版叔编《周作人类 5》，湖南出版1998年

39)乐黛云、陈惇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第453页。

“社会集体想像物”相背离，却不断影响和改变着集体想像物，推动社会形成一种新的想像物，体现了这一群体的变革精神和先驱作用。

V、《我的邻居》与朴烈事件

虽然当代比较形象学“从原来注重辨析形象与参考系（即现实中存在的那个异国）的真伪程度转而注重研究形象塑造者一方”⁴⁰⁾。但笔者以为，探溯作家创作的原型，还是必要的，尤其像台静农这样以忠实于生活之创作态度而著称的作家。那么，《我的邻居》的生活原型究竟为“何方神仙”呢？

台静农写作《我的邻居》，可能受到真实事件的影响。我们看到，小说开头是以“我”读到报上新闻：“朝鲜人，谋炸皇宫，被警察擒住，已于某某日正法”，而引出对邻居的回忆和介绍的。关于谋炸皇宫的事例，见诸报端的有发生在1924年1月5日的“东京二重桥”事件，即义烈团员金址燮在日本皇宫门口投弹未遂，炸毁宫殿一部分，其本人被捕牺牲的义烈事件。对此，上海《申报》以《日皇宫外发生炸弹案》⁴¹⁾的新闻稿对此有过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便衣破门而入，将“邻居”带走前，问过一句关键性的话：“你是朝鲜人吧？有个金某你该认识？”。这里的“金某”虽不能肯定就是谋炸皇宫的金址燮，但不妨推断金址燮投弹案曾在台静农心中留下了印象。

同时，如前所述，从创作时间看，朴烈事件发生在先，台静农创作在后。台静农在《地之子·后记》中说：“直到一九二六年冬……关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年要不要继续的问题发生了……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我的邻居》为《地之子》中第一篇，当在1926年冬创作，其时朴烈及其同仁，被捕已经3年余，从事件的特征看，朴烈被判死刑时年仅24岁，并图谋用炸弹暗杀；与小说中人物“谋炸皇宫……年二十余岁”不谋而合，而朴烈为策划暗杀和获取炸弹，多次回汉城与义烈团的负责人金翰会见，这里也有个姓金的人物。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就断定朴烈事件和《我的邻居》中描述的是同一事件，但以台静农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论，若他与流亡中国的韩人毫无往来，尽可以

40) 乐黛云、陈惇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第453页。

41) 《申报》，1924年1月17日。

写自己熟悉的乡土小说，几无杜撰韩人形象的可能。

因此，在台静农的周围，应当有作为原型的韩人。据《台静农传略》⁴²⁾考证，台静农1925年认识鲁迅，并一起成立文学社团“未名社”后，期间至少与韩人金九经相识。如1929年6月3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携行李赴津浦车站登车……金九经……台静农皆来送⁴³⁾”。这位金九经先生，即韩人，原在汉城帝国大学任教，1924年移居北京，就住在“未名社”的社址里；1925~1928年间，金九经在北京大学任教⁴⁴⁾。从这些有限的史料中，虽然难以认定住在“未名社”、任教北大的金九经先生，便是“邻居”的生活原型，但可以肯定，小说里那个明显带有异族社会、文化烙印的形象，是经由作家特殊感受而创作的，这种特殊感受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想象中得来。从小说绘声绘色的细节描写中，至少可以推断，“东京二重桥”事件、“朴烈事件”、交往中的韩人朋友，以及有关韩人抵抗的其他报道和言论，都被作者糅合进了形象的塑造。

但是，台静农祖籍安徽，熟悉的是安徽农村的乡里乡亲，显然不可能像东北籍作家那样，与韩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和了解，而描写抗日期间韩人形象的作品，主要都出自东北籍作家群。这足以说明，台静农的众多作品中，为何惟独这样一篇题材迥异的另类小说；也足以解释，为何这篇小说形成了“内容含蓄、主题多元”之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的邻居》中用众多细节塑造出的韩人形象，多少有些朦胧。读者完全不知“邻居”的昔日，甚至不知他除了蛰伏、散步、吸烟和焚纸外，究竟在干些什么？读者不由得和作者一起去探究神秘的邻居，想象他在从事的秘密工作——一个有许多人参与的民族复兴事业；通过他的行动，读者慢慢走近了他，认识了他——一个忍受困苦，坚定执著地为事业奋斗的韩人形象。作者用笔克制、简省，虽然人物朦胧，却自有一种朦胧的美。莱辛在评论荷马描绘海伦之美时说：“荷马故意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正是荷马才会使我们对海伦的美获得一种远远超过艺术所能引起的认识。回忆一下他写海伦走进特洛亚国元老们的会议场里那一段诗，这些尊贵的老人看见了海伦，就彼此私语道：‘没有人会责备特洛亚人和希腊人，说他们为了这个女人进行了长久的痛苦的战争，她真像一位不朽的女神啊！’能叫冷心肠的老年人承认为她战争，流了许多血和泪，是值得的，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还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意象呢？”⁴⁵⁾笔者以为，荷马是自叹无法用笔描

42) 夏明钊：《江淮文史》，2001年第3期。

43)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646页。

44) 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四），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绘海伦之美，故而用“美的效果”来写美；而台静农自觉不熟悉韩人的身世和经历，便使用富有包含性与暗示力的小说语言，只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让读者得以尽情、尽兴去填补人物朦胧而形成的巨大审美空间，从而获得再创作之美的愉悦。

莱辛在讽刺那些试图描绘海伦之美的诗人时说：“如果一位诗人想去试做荷马由于明智而放下不做的事，他是多么愚蠢⁴⁵⁾”。因此，台静农是明智的，他塑造出一位神秘朦胧的韩族英雄形象，体现了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由于小说叙事的含蓄朦胧，《我的邻居》表现出“多主题”（或曰“无主题”）的特征。若以小说主题为歌颂韩人的宁死抗争，其实文中的“邻居”并无任何英雄举动，至少读者看不到其轰轰烈烈的抗日义举；说小说为唤醒国人之抗日意识而作，文中除了我对邻居的敬重、对其被捕的愤怒，其实并无进一步的主题生发。然而，主题的多元并未使《我的邻居》失去主题，反而使其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达到了朴素、蕴藉的美学境界。

5、结语

综上所述，台静农和周作人在各自的作品中塑造了颇具“血性和勇气”的韩人英雄形象，并通过“他者”与“自我”的比照，意图激起本土人民的血性和勇气。尽管两者塑造的英雄形貌不同：“邻居”是忍辱负重、饱经风霜的硬汉类型，而朴烈则是柔中见刚的儒雅之士，但两者合在一起，可谓刚柔并济、文武双全，都是时代的英雄典型。

那么，这种对英雄叙事的热衷，只是台静农和周作人偶然的创作“例外”吗？研读一下“五四”文人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这种英雄叙事，并不是个别作家的偶然文学行为，而是近代中国在历经腥风血雨、饱受奇耻大辱后的一种求生存、图强大的共同诉求。从梁启超、严复开始的文化先驱即已意识到对国民进行英雄教育的启蒙作用，积极提倡建构民族的英雄神话。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倡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⁴⁷⁾，提出以一百篇人物传记来囊括中国文化的全部，弘扬英雄主义；鲁迅激赏：“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45) 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46) 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

47) 梁启超：《本告白》，《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

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⁴⁸⁾”；陈独秀极力主张“以吾辈中国昔时……大英雄之事迹，排成新戏，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⁴⁹⁾”。这种努力得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与此相呼应的创作实践，便是作家们大量的创作和译作。他们极力推介国外英雄人物，如介绍拿破仑、卑斯迈传记，重新解读历史，对岳飞、《史记》进行英雄化改写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启蒙图强，最终在中国建立足以与西方列强抗衡的、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

因此，台静农和周作人的这两篇作品，包括前文提到的“韩人题材小说”，虽不是作家的代表作，貌似创作中的一个例外，但即使是作家们的这些“例外”，也符合当时社会“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呼声，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诉求。由此，“例外”也就有了普遍性的价值意义。

“一国文学中对于异国形象的表述，重要的不是追寻一个文化事实，而是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⁵⁰⁾”。作家们所塑造的韩人英雄形象，或激昂慷慨，或忍辱负重，或舍生忘死，都活生生地生活在作者当下，因此更贴近社会实际，更具有社会的现实意义。

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只是混杂着‘注视者’情绪和观念的对异己文化的印象”⁵¹⁾，作者以形象化方式欲传达的，正是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范式。因此，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人形象的剖析，我们既能审视想象世界中的“他者”身影，又能反思自我或本民族的内心和境遇，从中感悟到自身缺乏的、自身要证实的、自身欲追求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以为，本文所进行的最重要研究，就是分析注视者——台静农和周作人的情绪和观念，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环境；而本文的价值所在，亦在于通过“自我”与“他者”的比照，揭示两位作家当年欲证实、欲追求的“本土”所缺乏的东西；以个案的方式揭示一个社会“救亡图存”的共同诉求，指向当时知识群体整体的现代化启蒙，那么，这个个案的研究便有了其普遍性的价值。

48)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迅全集》6卷，第11

49) 陈独秀：《论戏曲》，原载《新小说》第2卷第2期，1905年。转引自王锺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古代）·小说戏曲卷》第51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0) 姜智《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社会科学出版200页

51) 张弘：《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25页。

参考书目

- 朴宰雨,《韩中国际合作精神的艺术表现——论中国现代小说里韩人抗日斗争的反映》,《当代韩国》2005年第4期。
-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周作人著,钟叔河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 杨昭全著:《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
- 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张弘著,《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刘萍著:《比较文学论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石源华主编,《〈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1910—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
- (韩)金昌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 张玄平《中韩两国当代文学比较研究》,《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1995年12月。
- 卢洪涛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 严家炎著:《五四的误读——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乐黛云、陈惇主编《中外比较文学名著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王锺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古代)·小说戏曲卷》第51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Abstract

KOREAN HERO NARRATIVES UNDER THE BASIS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WU MIN

Tai Jingnong’s novel “My Neighbor” described the wise character of a Korean hero by a series of unique detail revealing his spirit and will.

Narrated story as a stand by, the author observed “neighbor” in the viewpoint of “I”. This set up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s and alter egos, the native place and the foreign land. “neighbor” and “I” has become the real portrayal and the symbol of sino korean nationality in different history condition and different psychosis at that time.

Zhou Zuoren paid his great attention to “Piao Lie event”, which shocked Japa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prose “Li Wanyong and Piao Lie” expressed the heartfelt respect to persevere and recalcitrant by prasiad to brave warrior Piao Lie. He criticized some countrymen who lacked the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and showed his grief, indignation and anxiety.

Tai Jingnong and Zhou Zuoren had showed hero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one man. The craving to heroic narrative was not accidental literary action.of several writers. It was the performance for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show their common political dem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e hero.

Key Words : TAI JINGNONG , ZHOU ZUOREN, KOREAN CHARACTERISTIC HERO, CONSTRUCTION THE INITIATION AND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